

蒼溪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政协四川省苍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王大政

苍溪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四川省苍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内 部 发 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数1—1000册

字数182千字

1996年12月苍溪县印制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内部资料准印证(97)087号 邮政编码 628400

工本费：9.20元

顾问
主编
责任编辑
校对

周承瞻
陈茂兴
孟益荣
阳先河

屈德发
阳先河
孟益荣

目 录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

“万水千山只等闲”	李国策 (1)
李国策生平简介	赵华修 (103)
苍溪人民解放委员会	文史办 (106)
苍溪县青年协进会	王峻峰 (130)
苍溪县鲁迅剧艺社	陶启荣 (135)
城厢镇解放回忆	赵义成 (136)
苍溪县各级人民政权建设述略	李元泽 (140)
建国初期苍溪的政权建设	侯廷培 (158)
歧坪区政府成立工作简述	刘兴炽 (162)
苍溪县建立的第一个乡人民政权	郑 嘉 (164)
漓土乡人民政权建立前后	杜 淳 (165)
建国初我参加东溪区始建工作概况	王邦熙 (170)
建国初期歧坪区工作实况	刘朝阶 (173)
建国初李寅县长召开的一次会议见闻	向文生 (175)
解放前夕苍溪社会情况见闻	王峻峰 (177)
苍城解放回忆	陈正福 (181)
伏回乡解放前夕混乱情况见闻	何从良 (189)
“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罗宝廷 伏立勋 唐洪刚 蒲清善	(194)

解放前夕东溪反动势力的挣扎	吴立名 (197)
解放前夕元坝、唤马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	陈天庭 (199)
人民解放军普贤寺剿匪见闻	姚代吉 (201)
清匪反霸模范李素珍	罗万金 (202)
清反减退在五龙	王邦熙 (204)
我亲身经历的一次清匪反霸	王培方 (210)
侯峨峰叔侄伏诛记	侯廷培 (213)
建国初期东青征粮斗争始末	寇永隆 (215)
忆征粮	何从良 (221)
解放初我参加苍溪征粮工作概况	舒克 (225)
毒打征粮工作同志的事件真相	潘正江 (228)
1950年柏杨乡的征粮工作	曾毓文 (230)
龙山第一个公审会	蒲清善 (232)
临解放国民党省保四团驻广、昭数事	孟琪 (235)
给四川省苍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一封信	张建平 张德润 (241)
老红军李国策关心我会文史工作	孟益荣 (244)
更正	(246)

“万水千山只等闲”

——我参加长征的回忆

李 国 策

我于1917年9月4日（农历丁巳年七月十八日）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城东南约20里的五里乡李家坪村。我们兄弟姊妹共5人，我为老二。父亲名叫李凌云，1971年去世。母亲任安碧，1939年去世，当时年仅40多岁。生母去世后，父亲续弦。继母也已于50年代去世。

一 上学读书

我在五六岁时即放牛、拾柴和背抱弟妹等，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八岁时开始上私塾读古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以后又读所谓“八本大字”，即《大学》、《中庸》等。学馆设在我们村对面的灵官庙，要过一道深沟才能到达。我们把老师叫“先生”。先生完全用旧时候的那一套方式、方法教学。他教我们读书，他念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教念一两遍之后，他叫我们自己念熟，然后就到他那儿去背。若背不下来，就下去再念，然后再去背。如果还是背不下来，他就用竹板子打我们的手心，或者叫我们躺下打屁股。我总是挨打，有时手被打肿了，吃饭时连碗都不能端；屁股打肿了，走起路来就一拐一拐的。我们这些学生也调皮得很，偷

偷地用刀子将竹板横割一条口子，先生不知道，拿起来打人时，用力一打就断了，气得他发抖。他有时候在地下挖两个碗大的小坑，里面放些小石子，令被惩罚的学生双膝跪在这两个坑里念书。石子把学生的双膝盖都扎破了，直流血。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可怜，就给先生送礼物，买两斤肉（四川叫刀儿菜）或两斤挂面送给他，他就对送礼人家的孩子好一些，不怎么打了。先生除了收取每家的学费之外，常年是轮流到各个学生家里去吃饭，每十天半月换一户，因而生活较好。每年端午节或中秋节，就是先生收礼发财的时候，每个家长都叫孩子给他送去一份礼物。读古书，只管念熟会背诵就行了，而会背诵的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更谈不上理解了，甚至离开书本，连书本上已有的字也不认识。所以，念了几年古书我什么也不懂。读古书只有一个好处，练习写毛笔字比较多，写得比较好。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同学，有的早就到小学或中学校去读书了，我对他们很羡慕，也想去，所以我总是向父母亲要求送我去小学读书。父母亲答应了，以后我就到离我们家只有五里地的五里场去上了完全小学校。因为我读古书有一些基础，一上小学就上初小四年级读书。我在小学读书很努力，成绩也很好，毕业时，张榜公布我是第三名。接着在高小班读书近两年，年终学期考试成绩，我是榜上第一名。我和我父母亲都很高兴。这时那位老八股“先生”说话了，他说：“从我手上出去的学生就是不会错嘛！”

这个小学是一个政治上很进步的学校，与地下共产党组织有密切联系，而且有两名教员就是地下党员，一名叫石玉真，一名叫李忠新。他们平时对穷苦人家很好，在学校上课

时，总是举例讲些进步道理。那时，共产党地下组织到处搞宣传活动，五里场街上老出现共产党的标语口号，多是油印传单。我在课外时，常到街上去玩，总能看见墙上贴的标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看了标语的字体，总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老师石玉真的笔迹。我只是心理这么想，不敢说出来。又联想到在每一次出现这些标语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都睡了，可是老师们屋子里的灯是亮着的，往往通宵达旦，我猜想这一定是他们在写标语传单。有时学校从县城中学请来的名叫王文焕的教员给我们讲课，他并不是按课文给我们讲，讲的似课内又多非课内的内容，其中夹着许多革命道理。比如，他说：现在你们学生如果知道街上的标语是谁写的，那可不能乱说，一个字也不能说，说了就认为你是共产党，只要你说一个“共”字，就会杀头的。这位王教员，每次来我们学校就会住上几天。我记得，我们学校总是时常来一个挑“货郎担”的人，肩挑小百货，手拿波浪鼓，在学校与教员是那么亲热，谈笑风生，住一个晚上就走了。他可能就是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因为国民党经常要抓共产党，传说我们苍溪县的地下共产党活动很利害。不久就传来不幸的消息，说王文焕是苍溪县共产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抓住枪杀了（按：全国解放后，在县城给王文焕同志立了烈士纪念碑）。我还记得，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名青年，他们全家是外来人，这个青年爱在街上打拳，也常来我们学校与教员在一起玩。有一次他在街上练武术玩，有许多人围观看热闹。这时正好有一个从南面来，路过五里场时在茶馆喝茶休息的人，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并戴一副黑眼镜。这个家伙，也在仔细的看那位青年的一举一动。这个青年在玩打

中，讲了些进步道理的话。那个戴眼镜的家伙站起来，坐着凉轿走了。可能就是他到了烟峰楼之后给县城打了电话，就在当晚的半夜里，从县城开来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连。我们正熟睡中，被军队的跑步声和报数声惊醒，吓得不敢睡觉。天还没有亮，军队就在街上搜查抓人，整整搜查了一天，把那位练武术的青年抓走了，说“这人是共产党，共产党闹事”。事后确实知道就是那个戴黑眼镜的官，派军队来镇压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那几天，我们学校不上课了，我们见不到教员了。军队开走之后，他们才回来。以后，红军离我们家乡不远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更活跃了。国民党抓共产党更凶恶，形势很紧张。我们学校的教员都离开了，学校关门了，我们也就从此停止上学了，我的学习生活也就结束了。这大概是1932年的事情。因为我父亲思想上进步，他与教员石玉真、李忠新混得很熟，关系很好，同时我也与这两位教员的关系很好，他们看到我所知道的事情什么也不说，很相信我和我父亲，所以，石、李二位教员在逃避国民党抓捕时，有时就跑到我们家中躲藏起来，我们全家千方百计保护他们的安全，热情招待他们。他们俩住在我们家中，成天在屋子里关着门谈话和睡觉，谁也不知道。父母亲告诉我说：“不准出去说有人在我们家中。”

学校关门以后，我就在家干活。其实，我在读古书和上小学时，也不时回家干农活，在农忙时尤其是这样，所以一般农活我都会干。我只几岁时，就常去放牛。我们四川家乡多是养水牛，它的劲可大啦！家乡到处是水田稻苗，牛爱去偷吃，我把牛绳牵在手里，眼睛老盯着牛，防止它吃稻苗，稍不注意，牛就把头扭过去吃口稻苗。它有时饿极了，强行

连续抢吞几口稻苗，你拉也拉不住。牛吃了别人田里的稻苗，是要挨骂的，甚至要赔偿，我真害怕。夏天的天气很热，水牛爱下水洗澡，可尽是稻田，长有禾苗，牛热得受不了，就突然下去倒在稻田里打滚，把稻田滚了一个大坑，牛也成了泥牛，好不容易把它打起来，我还得下水把坑平整好，并给补栽好稻苗。我除了放牛、拾柴之外，还担任在家中看管弟妹、做饭等家务，大人下地干活走了，我在家蒸白薯，烙高粱面饼，做好之后背上弟弟或妹妹，手提着饭，送到几里地远的地里给父母们吃。我还会锄草、翻地、点豆子、栽红苕、插秧苗、收割麦子、打稻子、磨面、碾米等，总之什么也会干，什么也得干，简直忙得很，累得够呛。在旧社会，我们家乡的传染病很多，几乎是应有尽有，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我就患过痢疾、疟疾、伤寒病。有一次我被传染上了伤寒病，可利害得很，差一点死了，真是死里逃生。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原在安徽、湖北、河南一带，即鄂、豫、皖苏区，于1931年进入陕南、川北一带，建立了川陕苏区，离我们家乡不远。这时传说很多，有说红军好的，也有说红军很坏的。说红军好，是说红军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能分到土地。说红军很坏，是说红军都长着很长的红头发，青面獠牙，光吃人。还有人说红军的一个头目红头发特别长，一对獠牙很长，张开血盆大口，每天要吃一个小娃娃。还有说什么红军“共产共妻”，“大姑娘都得去给红军当老婆”等等。说红军很坏，这当然是国民党的宣传，是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这期间，国民党为了“要消灭红军”，调集大批国民党军队去围剿红军。国民党的军队从成都、重庆方面开来，经过我们家乡一带，

北上到川北去打红军，妄图阻止红军继续南下。国民党的军队沿嘉陵江两岸源源不断地日夜北开，人多得很。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军队。军队从我们家乡通过，当地把过队伍叫做过“良子”。国民党军队到处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四散逃命。他们还强行抓丁，拉夫，捉鸭，拿包袱，弄得鸡飞狗叫，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打败了，又连夜兼程南逃。溃散的队伍，三五成群，争相逃命。这时，这些家伙更坏，烧、杀、抢、奸，坏事干尽。老百姓谁也不敢下田干活，都是藏在山里。我记得，我们家就在山里住了半个多月。以上是 1933 年春天的情形。

二 当儿童团长

后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打到了我们家乡，扩大苏区，也扩大了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打到我们家乡以南十多里远就停止前进了。我们家在嘉陵江东岸，红军也没有西渡过嘉陵江，在江这边就停止前进了，敌我以嘉陵江为界，从广元、苍溪到阆中县的江东是红军防线，江西是国民党军队防守，所以我们家乡一带就成了红、白两军对峙的地方，即白区和苏区的交界地方。在我们李家坪村两边的山头上，就可以居高临下清楚地看见江对面河坝里的国民党军队在修工事，我们老提心，怕国民党军队再打过来。

红军到了我们家乡之后，共产党地下组织公开了，一些地下党员公开活动，进行革命工作。比如李忠新、石玉真

等，他们立即当上干部，给红军筹集粮草，建立基层地方政权，宣传共产党的好处，扩大红军。我们五里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我父亲任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可见我父亲的思想进步和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就开始进行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划阶级成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等活动。将群众组织起来，先后成立有贫农协会、妇女组织（又叫内务部，主任叫内务）、不脱离生产的赤卫军（等于现在的民兵）等，儿童也被组织起来，叫儿童团，我当上了我们村儿童团的团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嘉陵江东岸是红军的警戒线，这一带的各个山头上是前线阵地，每个山头都修有工事，用席子和树枝搭成许多哨棚。多数哨棚是我们儿童团担任放哨，只有少数极重要的山头上的哨棚有红军防守，也有一些哨所是由赤卫军站岗放哨。我们想办法迷惑敌人，拾些柴草，把它点燃之后，人就走了，哨棚那儿成天冒烟，敌人以为有人，其实没有人，敌人还认为是红军在防守，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儿童团除了担任前线警戒放哨之外，还在内地重要路口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敌特及地主等坏人的破坏活动。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的人民外出，都得到村政府开路条，凡有路条的人才能放行。我们儿童团查路条，很认真，很严格，即便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也得要看有否路条，没有就不准通过，对任何人都不随意放行。

三 参加红军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宣传队，随时随地宣传扩大红军，动

员苏区男女青壮年去参加红军，红军队伍扩大很快，每个县、区、乡都成立了独立团、营、连，我们五里乡就成立了一个独立营，青壮年多数都参加了红军。我们乡独立营的营长、教导员，是从住我们家乡一带的红军一个团的政治处派来的干部担任，其余干部是从当地参军的人中选的。教员石玉真参军到正规部队，当了师部的书记；教员李忠新任我们乡独立营第一连的政治指导员。苏区的男女青少年甚至三四十岁的男子汉，参加红军的很多，有的地方多数人都参加红军走了，在家的多是小孩、妇女和老人，当然也有一些虽然年轻但确实不能参军和不愿参军的。我们这个乡就参加红军走了200多人。可想而知，参军的人很多，红军在川陕苏区就扩大到数万人。我们家乡一些和我小时就在一起的少年也参军了，背着的大刀上系有一块红布，戴着八角帽，上面有一颗用红布做的红色五角星。他们都开展宣传扩大红军，批斗地主等工作。我看到他们那么威武，心里很羡慕，也跟他们一块儿到处跑，肚子饿了就到村或乡苏维埃政府去吃饭。我高兴极了，觉得当红军就是不错。

红四方面军各级政治部，都下属有一个新剧团，等于现在部队政治部门的文艺宣传队，是负责口头宣传、书写标语、文艺演出的。师以下的宣传队中没有女同志。有两次，我到五里场去，正好遇上宣传队来这里演出，音乐是那么好听，节目是那么好看，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真开眼界。我心里想：如果我能够参加宣传队，该多好呀！

1933年8月的一天，两位已参加了红军的同学（我记得可能是李国连、任文金）来到我的家中。当时我父亲不在家，他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只有母亲在家。这两位同学是

出来宣传扩大红军的。他俩与我聊天，谈参加红军如何如何好，谈得很热闹，我也很高兴。我母亲不愿让我离开她，对我看管得很严。这时两位红军来家了，母亲总不让我和他们俩在一起谈话，老叫我出去干这干那的，设法使我离开他们。其实，我早想参加红军，两位同学与我暗中已商量好，叫我现在就偷偷地走，如果偷走不成就硬走，老给我使眼色。我当时想偷偷走，但母亲寸步不离。我只得当面向母亲说出我现在去参加红军并和他俩一起走。母亲不同意，劝我，我根本听不进去。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和这两位同学一起出门走了。我们走得很快，母亲在后边追赶，想把我拉回去。可是我们年青人跑得快，母亲根本追不上。母亲看见我们三人已爬上村后的高山只好回去了。我们三人上山之后，到了李国连的家里，他看了他父母亲，我们喝了水，坐了一会儿就去乡苏维埃政府报到。我一到五里乡苏维埃政府，就去找父亲，见到父亲时，我的母亲已在那里向我父亲哭诉着了。我愕然了半天说不出话。我母亲还是叫我回家去，我直说好话，父亲不吭声。最后，父亲才劝母亲说：“去就去吧！不要伤心了，他以后会回来看你的。”这一下我可高兴了。父亲和母亲商量着：“他到哪儿去当红军为好呢？”他想了想又说：“就到李忠新指导员他们那儿去吧！儿子和他熟，好照管，我们也放心。”母亲同意了，点点头，落下几滴眼泪，抬头看了看我。这一天是赶集日，街上人很拥挤，李指导员也来赶集了。他到乡苏维埃政府来，我们正好碰见了。他问我们：“怎么，你们全家都来了？”我说：“我来参加红军。”他说：“那好呀，就到我那儿去吧！”这正合我们的心意，我父母满口答应了，我也点了点头。父亲说：“到你那

儿去，我就放心了。”母亲说：“他还小，请你多照管他。”我们又和李忠新指导员一起到饭馆去吃了一顿饭。母亲还给我买了一些吃的东西带上，下午我就和父母分别了，跟随李指导员到部队，分配我任他那个连队（独立营第一连）的书记。从此，我就光荣地参加了红军。那时是1933年8月份，我年仅16岁。以后，我就在革命行列里不断成长，由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即民族解放战争）、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四个革命时期，亦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到写回忆录的今天（1985年），已是52个年头了。

我在参加革命以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常处于极其艰险的环境之中，我对革命事业也是忠心耿耿，没有丝毫动摇过，对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坚定不移，坚信不疑。这主要是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伟大的进步力量，新的革命力量必然会战胜反动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人民终将得到解放，因此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敌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真理。我有了以上这种认识和信念，所以对革命从不悲观与动摇，在那十分艰难的日子里，行军没有掉过队，打仗不怕死。对于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除外）也没有躲避过。我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在党内外也没有受过任何处分。虽然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努力，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我个人的进步是不够快的，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很小的。

所以说，不是党欠了我们的账，而是我们欠了党的账。我只是千千万万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中的一员，我对革命事业贡献不够，盼望儿女们和第三代去努力弥补吧！

四 在川陕苏区

我参加红军，到了独立营第一连，当天就到连里任该连连部的书记（即文书，那时都把连队的文书叫书记）。这个连当时住在五里场以南 20 多里地的娘娘庙前边的山上，担任第一线防御警戒任务，主要的地方是红军主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第一营的部队防守，营部就驻在娘娘庙。我们连受这个营的指挥。当时，我并不知道“书记”要干些什么工作，连长和指导员叫我造全连人员的花名册，每日向营部写敌情和执行防守任务的情况等报告，向下送通知，领发口令。刚成立的独立营，尽是当地的新战士，枪支很少，我们连只有几支步枪，有的还打不响，一百多人的连队，绝大多数人是拿的大刀、长矛。深沟对面的盘龙山上，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防线，离得很近，肉眼就可以看见敌人的一些活动。国民党军不时来偷袭我们，几乎是每天夜里都打仗。有时敌人白天也出来抢粮，抓鸡，我们一见敌人就开枪打。我们连的连长、指导员忙得到处去检查与指挥各班、排防御工作。有时指导员将他那支步枪交给我，我和大家一起射击敌人。晚上我睡不着，老怕敌人来袭击，把我偷偷地抓走就坏了。我们营部是每三天发一次“口令”，所以我每三天得去营部一次领“口令”。营部在我们连东边的粉壁垭，距离约有 20 里地远。我去营部得翻一座大山，再过两道深沟才能

到达那里。山很高，沟也很深，尽是密林。因为敌人常偷偷地到沟里的村庄来抢老百姓的东西，我当时年岁小，没有打过仗，老怕路过深沟时遇见国民党兵把我抓走。我一下到沟里，就像兔子似的飞跑，鸟从树上飞起，把我吓得心里扑咚扑咚直跳。到了营部领上“口令”就忙往回跑，怕天黑了出事。因为我经常去营部，和营部的人混得很熟悉，在当年的冬天，我被调到营部任书记。我在营部工作，大约只有四五个月时间，在1934年的春天，我又被选调到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政治处新剧团去工作了。因为我们这个独立营是二六七团领导与指挥的，营长、教导员等领导干部也是这个团派来的人担任的，当然独立营的人员就归由这个团调动。这个团的部队就驻守在我们家乡一带地区。1934年秋天，独立营被取消了编入二六七团的其他营。

我被调到新剧团当宣传员（演员），心里很高兴，只不过离家远了一些——驻在烟峰楼（大镇子），这里离前线有40多里，一八九师师部就驻在这儿。我到了新剧团之后的具体工作，先是在音乐班学敲打小鼓。所谓音乐班，实只四个小鼓，一个大鼓，八副小铜钹和八支笛子组成，曲调也不多，就是那么十多个曲牌，很简单。那时谁见到过现在这些现代化的乐器呢？可是就是这么落后的乐器，在当时的红军中也是不简单的了。这些音乐器材，最大的好处是携带方便，便于在行进中吹打。我们新剧团都是挑选18岁以下，人长得漂亮，也很聪明活泼，还有点文化的男子。各级领导最喜爱自己的新剧团，当成宝贝似的爱护。他们经常逗我们这一伙“小白脸”。我们中有的只有12岁。在红军队伍中，唯有新剧团的同志穿着最整齐、最漂亮、最好看。其他红军